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思想文化史卷

本卷主编 张聪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思想文化史卷

本卷主编 张聪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思想文化史卷/伊沛霞,姚平,张聪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25-5725-7

I. ①当… ②思… II. ①伊… ②姚… ③张… III. ①汉
学—研究—世界—文集 ②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313 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思想文化史卷

张聪 姚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5 字数 450,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725-7

K · 1336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序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姚 平 译

1966 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 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 1966 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 19 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 (James Legge)、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卫德明 (Helmut Wilhelm)、威利 (Arthur Waley)、高本汉 (Bernard Karlgren) 等。此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Y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 年贺凯 (Charles Hucker) 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

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957 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957 年)及倪德卫(David S. Nivisi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 1959 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 1966 年至 1971 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 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 1949 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

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倬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兵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 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 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 70 年代，大学各系多已

^①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

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 80 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 80 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 60 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 1962 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80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花大量的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梅隆[Mellon]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1951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以后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受

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①,从而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 70 年代的十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 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②(*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 年)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 1982 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 28 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加大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 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化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

① 这两个组织在 80 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② 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60 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 90 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China political scientist)或“日本经济学家”(Japan economist)。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在系里低人一等。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 9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的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四十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 1969—1970 年期间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还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 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

目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标识(identities)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local perspectives)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中国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前言

张 聪 姚 平

这部集子是《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系列的一册,以思想文化史为主题。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始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从 17 至 20 世纪上半期,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在欧美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地理、历史、语言文字、哲学宗教思想及其个人在华经历的书籍。这些出版物不仅造就了欧洲第一代早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而且提高了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对欧美某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 19 世纪上半期开始,欧洲国家相继出现亚洲研究团体,一流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随后开始设置东方语言文化课程,聘用教学研究人员,专业学术刊物也逐渐增多。这些都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逐步成型。

欧洲汉学家最早的研究兴趣之一是儒家思想文化。这与耶稣会士的宗教背景及其传教策略密切相关。很多耶稣会士认为,相较于宋明儒学,先秦儒家思想更接近天主教义。所以最早被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典籍多是先秦儒家著作。在系统翻译传播中国思想文化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当推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理氏曾定居香港三十年,回到英国后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其间他与人合作出版了长达 50 卷的介绍亚洲国家重要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东方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1879—1910)。这部巨著中包括了理雅各主持翻译的《尚书》、《孝经》、《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孟

子》、《诗经》、《左传》、《道德经》、《庄子》等书的全部或部分章节。理雅各的译文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的翻译实践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西方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投身其中,借助翻译注释来表达他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从同一文本被反复翻译诠释的角度来看,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与思想文化史相比。其中,对先秦儒家、道家经典的兴趣更是长盛不衰。据不完全统计,《老子》已有近百种西文版本,《论语》的英文版本也有六十种。单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六种新的《论语》英文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尽管质量参差不齐,对某些概念的解释有时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却是欧美近二三百年来研究中国,特别是早期哲学和思想文化在规模和深度方面最好的见证之一。

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心于二战之后由欧洲转移到美国。战后美国第一代中国史家大多曾在中国生活过,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他们的学术兴趣因此集中在近现代及帝制晚期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秩序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考多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们对儒家思想多持否定批评态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①中就提出儒家思想的保守性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稳定,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其著名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②中更细致地描述了儒家在晚清和近代步步失守,成为博物馆陈列品的命运。此外,他还将儒家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失败归结为儒家文化所推崇的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他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解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时,也从科技史的角度指出儒家传统的缺陷: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妨碍了对自然的探索 and 科技推广。

①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

②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1965年。

与对近现代史的关注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专著的数量也很有限。最权威的中国思想通史可以说是卜德(Derk Bodde)翻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①。断代史研究则承袭汉学研究的传统,兴趣集中于先秦思想。威利(Arthur Waley)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方式》^②和牟复礼(Fredrick W. Mote)的《中国思想之渊源》^③都以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为研究对象。这两部书篇幅很短,但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必读书。顾立雅(H. G. Creel)的《孔子其人及其神话》^④和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孔子:即凡而圣》^⑤虽然都以孔子其人及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但写法却有很大差别。顾立雅把他的书看作一次寻找“真实孔子”的尝试,为此,他把孔子作为教师、学者、哲学家和改革家分章加以描述分析。芬格莱特的兴趣则是诠释《论语》中礼的范畴和意义,并强调孔子之礼浓厚的人性色彩。

7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有关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方面研究的崛起。在此之前虽有一些专著论文,但这一领域的真正起步得益于陈荣捷和狄百瑞(William de Bary)两位先生。陈先生在美国多所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几十年。从60年代开始,集中研究朱熹,并于1982年在夏威夷主持召开“国际朱子会议”。他中英文著述甚丰,英文有关朱熹的重要著作有《朱熹与新儒

① 冯友兰著、卜德译,《中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该书的上卷曾于30年代在北京出版。其两卷本在1952和195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威利(Arthur Waley),《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9年。

③ 牟复礼(Fredrick W. Mote),《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诺普夫(Knopf)出版社,1971年。

④ 顾立雅(H. G. Creel),《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约翰·戴(John Day)出版社,1949年。

⑤ 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哈珀(Harper)出版社,1972年。

学》^①、《朱熹的生活与思想》^②、《朱熹新探索》^③等。他的研究多强调朱熹在完成儒家道统之说、编注四书和集儒家思想之大成方面的贡献。狄百瑞教授的儒学研究最早始于翻译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至今已足著作等身，最重要的有《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④、《新儒学的展开》^⑤、《新儒学的正统与心学》^⑥、《中国的自由传统》^⑦、《新儒学中心的概念》^⑧、及《为己之学》^⑨等。狄百瑞不同意很多西方学者关于儒学保守性及其导致社会停滞的观点，这一立场从他早期的《新儒学的再评价》^⑩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反，他主张从儒学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其传统价值的本质，并强调儒家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取向和主体创造精神。狄百瑞从道统概念的提出、朱熹对理的规定、儒家个人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等多方面阐述了这种自由主义取向。另外，他还通过发掘程朱理学中的心学因素重新审核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关系。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陈荣捷和狄百瑞两位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资料翻译方面所作的贡献。陈先生早于 60 年代就把《阳明传习录》和

① 陈荣捷，《朱熹与新儒学》(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6 年。

② 陈荣捷，《朱熹的生活与思想》(Chu Hsi: Life and Though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③ 陈荣捷，《朱熹新探索》(Chu Hsi: New Studies)，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9 年。

④ 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 年。

⑤ 狄百瑞，《新儒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 年。

⑥ 狄百瑞，《新儒学的正统与心学》(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 年。

⑦ 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

⑧ 狄百瑞，《新儒学中心的概念》(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 年。

⑨ 狄百瑞，《为己之学》(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 年。

⑩ 狄百瑞《新儒学的再评价》(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收于芮沃寿(Arthur Wright)主编，《中国思想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 年。

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翻译成英文。他编选的《中国哲学资料汇编》^①长达八百多页,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哲学、历史、宗教、东亚研究系常用的教科书。另外一部大部头的资料汇编是狄百瑞、陈荣捷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合作的两卷本《中国传统的源流》^②。这部书历时十年完成,其中思想文化史的比重最大。

继陈荣捷和狄百瑞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儒学研究从 80 年代以来深入发展。这特别体现在围绕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用法的讨论上。这一词汇最早在 17、18 世纪就为传教士们使用,用来区别于先秦儒学的“新”的儒家思想。它虽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偶尔被使用,但在学术界取得很大影响还是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问世之后。作为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新儒学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具体含义往往不同。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开始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并建议继续使用它的学者说明其具体含义。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在《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③和《儒家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④及其他论著中都特别强调,为了能够反映宋代思潮的丰富多样性,建议用“道学”一词来代替新儒学。本集中收集的田浩和狄百瑞的两篇论文反映了这一论争的一些情况,稍后还会提及。

田浩的提议及其被逐步接受反映了学者们的一个共识:即新儒学一词在外延和内涵上的差别使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研究中过分突出新儒学地位的后果是把历史上复杂的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简单化。很多学者的注意力从 80 年代以来转向研究宋明儒学中“新儒家”以外的人物,并着眼于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儒学的发展。田浩在《儒家

① 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汇编》(*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年。

② 狄百瑞、陈荣捷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编,《中国传统的源流》(*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 年。

③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年。

④ 田浩,《儒家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2 年。

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一书中认为,要想更清楚地理解宋代思想的历史语境,必须研究朱熹的批评者。他并主张加强对道学的研究,探讨它如何从一个思想不完全一致,但有很多共同政治目标的群体演变成一个以朱熹为正统的学说。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文化中的思想变迁》^①则关注唐宋时期“士”对价值观的思考。他研究的重心不是道学的胜利,而是8到11世纪士人精英对个人修养、写作、社会政治责任、道德与文化的思考。他笔下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代表了不同的儒学思想倾向。包弼德并特别强调苏轼哲学对程颐的挑战,指出正因为程朱学说后来取得的“正统”地位,苏轼才仅仅被看作是诗人、散文家。

学者们对朱熹学派以外的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了唐宋以来思想流派的复杂多元性。巴瑞特(T. H. Barrett)的《李翱:佛家,道家,还是新儒家》^②、陈弱水的《柳宗元和唐代中国的思想变迁》^③、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韩愈与唐代对统一的追求》^④反映了唐代三教在语言词汇和思想方面的互相交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道教和佛教对唐宋儒学复兴的影响。麦大维(David McMullen)的《唐代国家与学者》^⑤研究表明,安禄山之变后,私人著书立说及写作成为唐代学术的主流。儒学正统思想虽然在宋代得到发展,但多数宋代士人对儒家思想系统化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很多人在其私人空间中信佛崇道。伯德维斯特(Anne D. Birdwhistell)的《向新儒学过渡:邵雍有关知识

① 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文化中的思想变迁》(*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ultur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 巴瑞特(T. H. Barrett),《李翱:佛家,道家,还是新儒家》(*Li Ao: 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陈弱水(Chen Jo-shui),《柳宗元和唐代中国的思想变迁》(*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T'a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韩愈与唐代对统一的追求》(*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⑤ 麦大维(David McMullen),《唐代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